**梁启超先生诞辰 150 周年纪念**

# 梁启超与国家图书馆的历史渊源

□ 吴密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2023 年是梁启超诞辰 150 周年，全国各地举行了许多纪念性的活动。梁启超曾任过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图书馆的馆长，2 月 23 日梁启超诞辰纪念日当天，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主题为“前哲垂范 文津日新”的纪念座谈会，开通“梁启超数字图书馆”，在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音乐厅举办纪念配乐朗诵音乐沙龙。7 月至 8 月间，主办了“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百岁手教已新华邦——国家图书馆藏梁启超先生手稿展”，以纪念这位启蒙先驱、文化巨擘传奇的一生。

梁启超文名天下，名满天下，公众对于他的一般印象和认识，有很多标签，比如维新派、保皇派、改良派、立宪派；也有很多面向，如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等等之谓，惟独对于梁启超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和图书馆学的倡导者的身份却不大了解或知之不深。实际上，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兴起于十九世纪末的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之一。早在万木草堂求学时期，梁启超受阮元设立灵隐、焦山书藏的启发，同时也看到英国“凡有井水饮处，靡不有学人，有学人处，靡不有藏书”的盛况，立意创办和扩充万木草堂书藏[①]，这成为他涉足近代公共文化事业的第一次重要尝试。维新变法时期，康梁维新派进一步将创办近代图书馆作为一项变法措施提上了日程，北京强学会“最初所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②]，上海强学会将“开大书藏”作为该会四大事业之一。流亡海外以后，梁启超有了近距离考察和学习西方图书馆经验的便利，开始接受并使用“图书馆”这一日译新名词，特别是在《新大陆游记》中以大量篇幅介绍了美国的四座代表性的著名图书馆。[③]

二十世纪初期，在梁启超等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国内掀起了创办新型图书馆的热潮。1909 年 9 月 9 日，清政府批准军机大臣、学部尚书张之洞的奏请，筹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1916 年，教育部规定凡在内务部登记的出版图书均须呈缴一份入京师图书馆庋藏，京师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开始体现。1917 年，梁启超决意退隐政坛，专事社会教

*本文系国家图书馆课题《国家图书馆藏梁启超手稿整理与研究》（NLC-KY-2023-03）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梁启超：《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器启》，汤志钧、汤仁泽主编：《梁启超全集》第 1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427 页。

[②]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梁启超全集》第 15 集，第 2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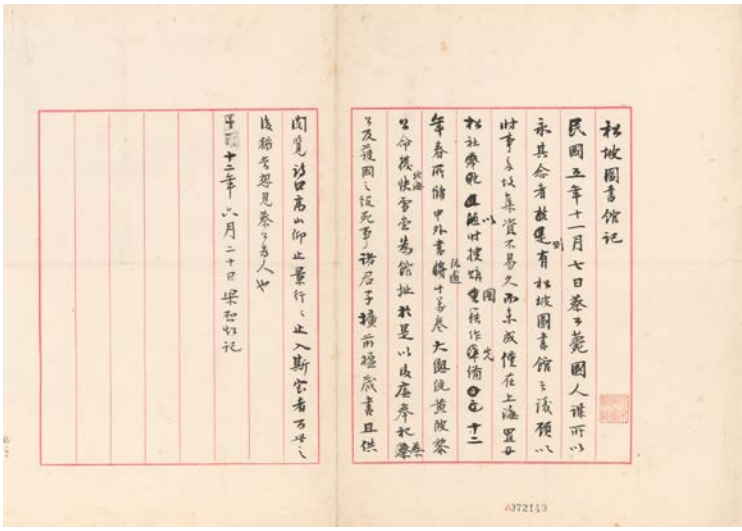
[③]梁启超考察并介绍的四座图书馆分别为：波士顿市立图书馆即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公共图书馆；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为美国的国家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属于高校图书馆；而有“捐助图书馆的圣人”之称的卡内基，其捐助的许多图书馆，例属纪念性的私立图书馆。

育和公共文化事业。他将很大的一部分精力投身于公共图书馆事业，创办了松坡图书馆，后来又在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担任北京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和松坡图书馆后来都并入了国立北平图书馆，三馆合一，奠定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基本面貌。今年是梁启超诞辰 150 周年，笔者根据相关文献档案和馆史资料撰成此文，以缅怀梁启超最后十余年间为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图书馆事业所作的卓越贡献。

## 一、创办松坡图书馆

松坡图书馆是为了纪念爱国将领蔡锷将军而设立的一座纪念性的图书馆。蔡锷是梁启超最为得意的学生，两人亦师亦友，密谋反袁，再造共和，居功至伟。1916 年 11 月 8 日，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医院，噩耗传来，梁启超痛哭失次，举国亦为之悲痛，国葬蔡锷的呼声不绝于耳。梁启超电请北京政府及大总统黎元洪，除了请求国葬，立传纪功，置造铜像之外，还打算做三件事来纪念蔡锷：一是倡设松坡图书馆；二是组织蔡公遗孤教养协会；三是编纂松坡遗集。这三件事又以第一件事最为难办。

12 月 5 日，梁启超为蔡锷举办了公祭与私祭仪式，在这之前的两天，他向北京政府及大总统及江浙、两湖、两广、云贵川、豫陕赣等省督军、省长发起松坡图书馆征求同意通电，电云：“蔡公松坡，功在社稷，民不能忘。沪上同人，议设一纪念图书馆，即在馆中奉祠铸像，庶可以范后人而垂不朽。拟恳我公赐衔发起，以资提倡，务乞垂诺。”[①]梁启超发起并创设松坡图书馆的想法受到了美国实业家和慈善家卡内基的启发，早年游历美洲时，他曾对此有过考察，以国内无一纪念性图书馆为憾。图书馆和纪念馆相结合，既可以典籍嘉惠士林，开启民智；又可以蔡锷的爱国精神和高尚人格垂范后人，培养国民公德。该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但因时事艰难，集资困难，仅在上海成立“松社”，作为松坡图书馆的预备。


松坡圖書館記

民國五年十一月七日葬于蒐國人謀所以永其念者故建有松坡圖書館之議預以時事多故集資不易久而未成僅在上海置安松社籌設且施以時機漸圖續作籌備已在十二年春所儲中外書籍十萬卷大總統黎公令撥快雪堂為館址於是以後產奉北京及復國之役死事諸君子遺前後成書且供

閱覽諸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人斯宜者百世之後稽考想見卷軸為人也

民國十三年六月二十日梁啓超記

图 1 《松坡图书馆记》（1923 年 6 月 20 日）

[①]梁启超：《致各当道通电——为设立蔡松坡纪念图书馆事》（1916 年 12 月 3 日），《梁启超全集》第 19 集，2018 年，第 713 页。

松社成立后，梁启超想方设法地搜购书籍。1918 年 11 月上书黎元洪，请求将保和殿所藏《四库全书》复本及总统府所购杨守敬观海堂藏书拨给松坡图书馆。1920 年 3 月，旅欧返国，以北京欧美同学会名义组织了读书俱乐部，收集外文图书六千多册。因为松社同仁大多数在北京，于是商议将松坡图书馆搬到北京, 并向民国政府申请馆舍。1923 年 6 月，搜集到的中外藏书已经积至十余万卷，梁启超上书时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请求拨北海公园的快雪堂作为馆址得到了批准。同年 11 月 14 日，松坡图书馆正式宣布成立，以北海快雪堂为松坡图书馆第一馆，专藏中文图书，西单石虎胡同七号为第二馆专藏外文图书，松社成员一致公推梁启超为馆长。

松坡图书馆为私立图书馆，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为了给该馆筹措经费，梁启超多次发起征捐。但是社会募捐远远不够开支，梁启超不得不长期“卖字”筹款。1917 年 2 月 17 日，《晨钟》登载《为捐助松坡图书馆鬻字例》，楹联、中堂、屏幅、扇面、册页等各有定价。松坡图书馆搬到北京以后，为了维持图书馆的运行，梁启超仍然坚持卖字。1925 年 4 月 1 日，《晨报》再次刊登《为松坡图书馆鬻字改定润格》。据梁启超的学生周传儒回忆：“梁每星期进城一次，住启勋家。梁每天晚饭后休息十分钟，抽支烟，在七点多钟开始写字，每晚都写，一个大字卖八块钱……梁这样卖字，每月可得二三千元。”[①]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也提到自己在忙碌了一天后，“一点也不觉疲劳，晚上还替松坡图书馆卖字”[②]。对于梁启超来说，写字是他第一等的娱乐，虽然不觉得累，但是长期的操劳，对其身体的损耗是可以想见的。

梁启超病故后，松坡图书馆再也没有选出继任馆长，由常务干事共同管理日常工作。梁启超是松坡图书馆历史上唯一的一任馆长。

## 二、京师图书馆馆长

1918 年至 1925 年间，由于时局不稳，京师图书馆更换了十几任馆长，经费更是一筹莫展，于是有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北洋政府教育部协商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之议[③]。1925 年 10 月教育部与基金会签订《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契约》，规定图书馆的管理权属于教育部与基金会所共同组织的委员会。正副馆长由委员会推荐，由教育部聘任。12 月 2 日，教育部根据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的推荐，聘请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并租用北海公园内的庆宵楼、悦心殿等处作为临时馆舍，调拨了京师图书馆原有的一部分人员组成了国立京师图书馆筹备处。

1926 年初，教育部因日常经费无法拨付，无法履行契约所规定的义务，合组国立京师图书馆的计划暂时终辍，京师图书馆继续在原方家胡同开馆。同年 10 月，京师图书馆正式

---

[①]周传儒：《回忆梁启超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第 313-314 页。

[②]梁启超：《致孩子们》（1926 年 10 月 19 日），《梁启超全集》第 20 集，第 230-231 页。

[③]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于 1924 年 9 月由北洋政府设立，作为保管和处置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的管理机构。该基金会决定发展文化事业暂从图书馆入手，与教育部约定两方合办教育部所辖之京师图书馆。

更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教育部致函梁启超，责成其迅妥派员接收。梁启超担任馆长期间，是国立京师图书馆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由于缺少经费支持，梁启超捐出了馆长薪水，又向北京商业银行商借，借不到了就自己垫付。吴其昌回忆："十五年夏，教部聘先生任京师图书馆馆长，而经费涓滴全无。初时挪用昔年馆中储积寒微之小款，先生捐馆长薪不取以维持。至冬，此余沥亦干，馆中无煤升火，无纸糊窗，余入之，冷风飕飕，乃如殡舍（时尚在方家胡同）。先生亦不裕，乃慨然将其本人五万元之人寿保险单，向银行押借、发薪、生火、糊纸，馆中人皆腾欢，暖如挟纩。此事徐森玉（鸿宝）先生亦常常对人称颂先生以私济公之美德。以私人生命之代价，济国家公共之文化，余至今三十八岁，尚仅见先生一人而已。"[①]

从 1926 年 10 月至 1927 年 3 月，梁启超将自己十余年来在永年人寿公司所买之保险单，向北京通易信托公司押借现款，半年间共垫出 9750 元（未计利息），以维持国立京师图书馆的运转。借款、垫款用尽后，经费仍无着落，梁启超不得不于 1927 年 3 月 11 日和 3 月 24 日，两次呈文请辞馆长职务。教育部一面慰留，一面催财政部拨款接济，无奈国库一空如洗，无款可拨。1927 年 6 月 15 日，梁启超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商量，希望能够拨借经费以维持馆务。教育部亦于 6 月 27 日致函该会，请求给予国立京师图书馆财政接济。经研究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先后函复教育部和梁启超，同意从 1927 年 7 月开始每月垫付经常费 2500 元，为期一年，国立京师图书馆才得以渡此难关。梁启超所垫之款直到其逝世后才全部清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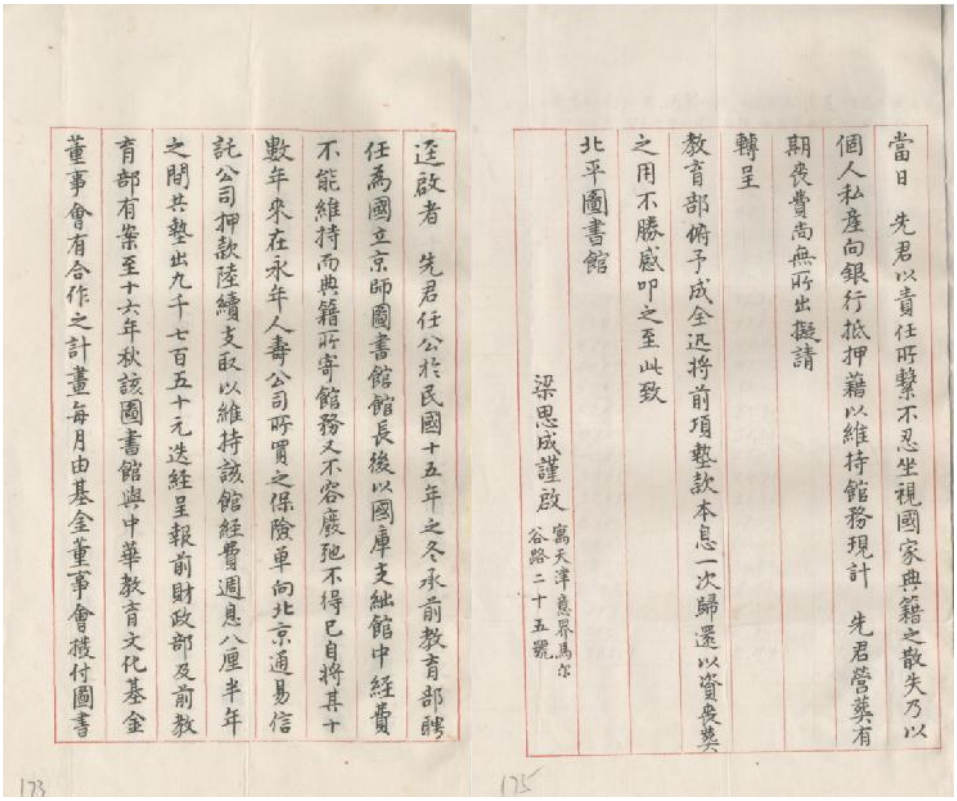

逕啟者　先君任公於民國十五年之冬承前教育部聘
任爲國立京師圖書館館長後以國庫支絀館中經費
不能維持而典籍所寄館務又不容廢弛不得已自將其十
數年來在永年人壽公司所買之保險單向北京通易信
託公司押款陸續支取以維持該館經費週息八厘半年
之間共墊出九千七百五十元迭經呈報前財政部及前教
育部有案至十六年秋該圖書館與中華教育文化基金
董事會有合作之計畫每月由基金董事會撥付圖書
當日　先君以責任所繫不忍坐視國家典籍之散失乃以
個人私產向銀行抵押藉以維持館務現計　先君營葬有
期喪費尚無所出擬請
轉呈
教育部俯予成全迅將前項墊款本息一次歸還以資喪葬
之用不勝感叩之至此致
北平圖書館
梁思成謹啟　寓天津意界馬尔谷路二十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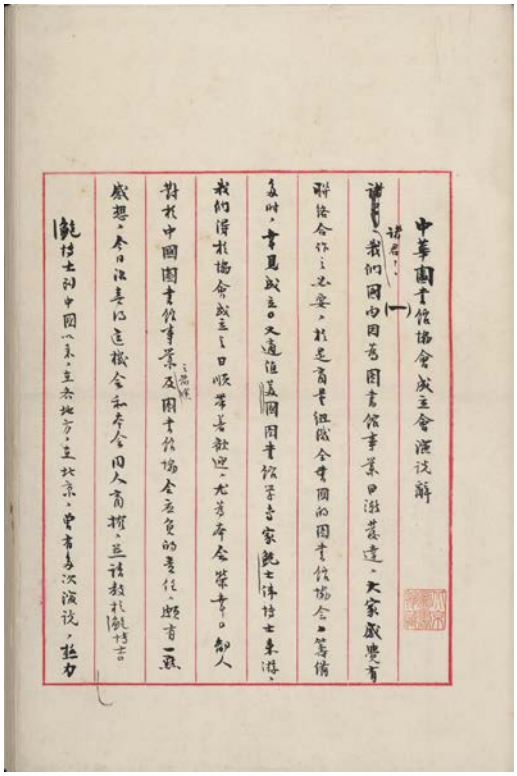
图 2 1929 年夏，梁思成代表梁氏家属函告平馆，
请予一次性偿还所欠垫款，以作梁启超的营葬费用。

[①]吴其昌：《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中央周刊》，1942 年 12 月第 5 卷 21 期。

## 三、北京图书馆馆长

1926 年，合组国立京师图书馆计划失败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在北海独立筹建“北京图书馆”[①]，仍聘请梁启超为馆长，直到 1927 年 6 月因病辞任。梁启超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在这里却很好地践行了他的办馆思想和图书馆学理念。

北京图书馆成立前的一年，中国图书馆界第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梁启超被推选为第一任董事长。梁启超在成立大会的演说中明确提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两项主要任务是“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1926 年 3 月，梁启超为中华图书馆协会创办的杂志《图书馆学季刊》撰写了发刊辞，再次提出“中国图书馆学”这个概念，认为建立中国图书馆学的主要途径是建立图书馆专业学校，大力发展符合国情的“中国图书馆学”，使图书馆专业学校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的摇篮。梁启超掌管北京图书馆期间，李四光和袁同礼共同襄赞，在图书馆学人才培养、管理制度、藏书建没和读者服务等方面，均较同时期的国立京师图书馆进步。以人才培养为例，北海图书馆任用的馆员有相当一部分或曾服务于其他图书馆，或毕业于图书馆等专业，北海馆任用的蒋复璁、严文郁、赵万里、曾宪三、何国贵、杨维新、王重民、于道泉、于震寰、顾子刚、李芳馥、李文祺、汪长炳、李钟履、岳良木、陈恩惠、彭色丹、李德启、王钦骞、爨汝僖等，后来成了合组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业务骨干。[②]


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會演說辭

諸君！我們國內因為圖書館事業日漸落後，大家感覺有聯絡合作之必要，於是有組織全國的圖書館協會之籌備。當時，書記成立之文通電各國圖書館學者家，絕大佳作之來港，我們接於協會成立之日，收著者數逾，尤為本會榮幸。御人對於中國圖書館事業及圖書館協會應負的責任，經有一番感想。今日在這裏組織全國圖書館協會，四人有幾，並請教於諸君。

[illegible]士的中國人來，主本地方，主北京，要有多次演說，盡力

图 3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词》（1925 年 6 月 2 日）

[①]1928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北京图书馆改称北平图书馆，为了与位于中海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相区分，再次更名为北平北海图书馆。

[②]李致忠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第 39 页。

梁启超还在图书分类方面作出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早在 1896 年，梁启超就在《时务报》上发表《西学书目表》，将当时所译西书分为学、政、教三类，大胆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图书分类体系，用以解决最为迫切的新译西书的别属和分类问题，来弥补中国传统“四分法”无法容纳西学译书的不足，为后来人们废弃旧法、改用新法类分图书开拓了局面。梁启超认为：“图书馆学里头主要的条理，自然是在分类和编目。就分类论，呆分经史子集四部，穷屈不适用，早已为人所公认。若勉强比附杜威的分类，其穷屈只怕比四部更甚，所以我们不能不重新求出一个分类标准来。”[①]杜威的十进分类法介绍到国内后，成为国内图书分类的蓝本。梁启超上任馆长后不久就和李四光和袁同礼讨论应尽快制定中国的十进分类法的问题：“迁馆事粗定后，即当从事编目，但非编目方针确定，则无从着手。鄙意宜自创中国之分类十进法，不能应用杜威原类，以强驭中国书籍，致陷于削趾适履之弊，守和兄研究有素，对于此问题当早有具体的方案，极盼早日写出，经一番讨论后，即行决定，照此进行。”在这封信中还提出请清华学校图书馆图书分类专家查修帮助实现这一计划。[②]北京图书馆开办之后，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研制了新的分类法，为合组后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普通古籍分类法的编制提供了借鉴。

## 四、三馆合一，遗愿得偿

梁启超以一人而兼任京师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的馆长，加上私立的松坡图书馆，以一人而三任。然而，在时局动荡，人力、财力、物力均不足的情势下，梁启超反对像美国一样搞群众式图书馆，希望聚精会神、集中力量在中国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一个“模范先行”的图书馆，作为全国图书馆学者的研究中心，以求得将来的分枝发展。因此，当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拟在北京设立图书馆时，梁启超即打算争取资金，多家联合，建设一个规模宏大的国立京师图书馆。在写给江庸的信中，他这样说道：

> 教育部直辖之方家胡同图书馆，顷已由弟完全接收，改为独立机关，定名国立京师图书馆。现在与中华文化基金会所设之北京图书馆仍暂取分立形式。弟以一人而兼两馆馆长，俟新建筑成立后再行合并，将来合并时再与文化基金会重新缔约……东方文化会设图书馆于北京，为原定计画之一，自当赓续进行。惟文化基金会既有此举，重规叠矩，于义无取。且除方家胡同旧馆有大批贵重图书外，若另造一馆，欲得此规模，实为不可能之事。即觅地亦大不易，现在养蜂夹道之地七十亩，亦几经曲折乃得之。鄙见以为最

[①]梁启超：《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1925 年 6 月 2 曰），《梁启超全集》第 16 集，第 109 页。

[②]梁启超：《致李仲揆、袁守和》（1925 年 12 月 20 日），《梁启超全集》第 19 集，第 271 页。查修（1901-1990），字士修、修梅，安徽黟县人。二十世纪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查氏早年就读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毕业后在清华学校图书馆工作。在此期间深入研究杜威十进分类法，1925 年发表《中文书籍分类法商榷》，编制《杜威书目十类法补编》。1927 年，依改良后的杜威十进分类法整理出《清华学校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

好是东方文化会、中华文化基金会、国立京师图书馆三方合作，成一规模较大之馆，岂非快事！此间唯一之条件则“国立京师图书馆”之名称万不能改易，其他皆可商量。[①]

从这封信可以看，梁启超的设想是继续推动两馆按原计划合并办馆。因为日本退还庚款的加入，他又积极推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及教育部管辖的国立京师图书馆三方合作办馆。教育部虽然缺乏资金，但是“国立京师图书馆”的主体地位和名称不可更改。

1929 年 8 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实现合组，这次合组在国家图书馆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改组后的名称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两年后，在养蜂夹道处（今文津街七号），美仑美奂、典雅庄重的新馆落成，改变了二十余年来馆无定所的窘境。1949 年春，北平解放后，松坡图书馆的常务干事叶景莘等将该馆情况报告给朱德总司令，并经当时的高等教育委员会批准，松坡图书馆合并到北平图书馆。梁启超为之倾注大量精力和热诚的三座图书馆合而为一，这无疑是其要在中国建成一座规模较大的图书馆遗愿的一种实现。

梁启超的晚年兴趣在于著书讲学，在于从事公共文化事业。他担任京师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馆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经费困窘的情况下，做了许多的实际工作。梁启超辞任馆长以后，仍然与北京图书馆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他最为擅长的方式贡献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他定下了两个宏伟的写作计划：“一是《中国图书大辞典》，预备一年成功；二是《中国图书索引》，预备五年成功。两书成后，读中国书真大大方便了。关于编这两部书，我要放许多心血在里头才能成。尤其是头一年训练出能编纂的人才，非我亲自出马不可。”[②]《中国图书大辞典》是其生前最后从事的一项大工程，此一编纂计划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其成果则归于北京图书馆。梁启超做得津津有味，多次向图书馆汇报阶段成果，可惜因为旧病复发，工程浩大，最终未能完成，现在我们只能看到若干残稿。梁启超去世后，梁氏家属遵其口头遗嘱，将 3470 种 41819 册饮冰室藏书永久寄存国立北平图书馆，供后人利用。新中国成立后，梁氏家属概然将《饮冰室文稿》等著作手稿并碑帖拓片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

[①]梁启超：《致江庸》（1926 年 11 月 11 日），《梁启超全集》第 19 集，第 128 页。“东方文化会”即“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是日本以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于对华文化教育事业的管理机构。当时江庸作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方委员到东京参加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第二届年会。

[②]梁启超：《致孩子们》（1927 年 1 月 18、25、26 日），《梁启超全集》第 20 集，第 242 页。